

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互鉴及超越*

胡宇哲

【提要】 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亲缘关系从一开始就深刻烙印在这两个学科身上。美国早期历史学一直以政治研究为中心,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起合作进行历史政治学研究。但是,随着学科科学化和职业化的发展,历史学和政治学逐渐分离开来。二者的再次合作归功于二战后社会科学方法在两个学科内的大范围运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历史学中叙事的复兴,政治学内部也陷于琐碎的政治片段并走向后行为主义,政治史与政治学再次分道扬镳。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历史学广泛借用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政治学也发现自身学科的发展绝不能缺乏历史学的帮助,因此,两个学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再次尝试互相联合,政治学出现了历史制度主义和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等领域,力图重新找回历史;历史学中的政策史等研究方向也广泛借鉴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两个学科的互动关联,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史以至整个美国史学发展的关键线索。追溯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互动分合的整个过程,也可以展望美国政治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政治史 政治学 美国史学史 历史政治学

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历史学广泛借用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政治学也发现自身学科的发展绝不能缺乏历史学的帮助。两个学科的互动关联,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史,乃至整个美国史学发展的关键线索。

美国学界一直不乏对政治史的批判和反思,如何借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政治史反思的重点。20世纪初,鲁滨逊的“新史学”即意在修正兰克模式对美国史学的影响,以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特纳(F. Jackson Turner)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也对政治史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革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史书写越发僵化,其地位先后被社会史和文化史取代,但一些史学家坚持认为政治史对于历史学仍然是有用且必须的。许多史学家提出了对政治史的反思,且多有论及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其中,不断有学者试图复兴二者之间的合作。^① 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对政治史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包括如何联系政治学来实现政治史的复兴。^②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判种族理论’背后的美国政治史论争研究”(项目编号:22CSS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3, 1986, pp. 585 – 600; Mark H. Leff, “Revisioning U. S. Politic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3, 1995, pp. 829 – 853.

② Meg Jacobs, William J. Novak, and Julian E. Zelizer, eds.,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Jeffrey L. Pasley, Andrew W. Robertson, and David Waldstreicher, eds., *Beyond the Founders: New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Julian E. Zelizer, *Governing America: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国内学界很早就关注美国政治史的发展变化,如李剑鸣指出美国政治史在二战后面临的困境,并展望了美国政治史多样化的研究范式;^①杜华、焦姣等人也注意到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在近些年合作后出现的新研究方向。^②国内研究表明,我们虽已注意到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的关联,但仍然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整体观察。一方面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互动,从整体上反映了两个学科各自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观察美国学术史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政治史与政治学有多次合作借鉴的过程,两个学科也在这一过程中超越了自身传统的发展路径,对当下的学术发展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本文从学术史角度出发,梳理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互动分合的整个过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史长期以来的发展变化,也可以展望美国政治史的未来方向。

一、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亲缘与初步分化

美国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职业化始于19世纪中后期,但在早期阶段,历史学和政治学并未分离开来。一方面,美国早期历史学一直以政治为研究中心,坚信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另一方面,早期政治学继承了从修昔底德到托克维尔的传统,认为需要从历史中发现不变的人性和政治原则。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两个学科之间日益分化,学科组织和学术话语趋向独立,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学科特征。

(一)作为孪生兄妹的政治史与政治学

从革命史学、人物传记到通史编纂,政治一直是美国早期历史写作的中心。^③19世纪下半叶,两个学科走向职业化和科学化时,历史和政治的纠缠并未减弱,实际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最能体现出两个学科的“家族相似性”。这一时期,他们的研究也被称为“历史政治学”。^④

历史政治学的早期代表弗兰西斯·黎白(Francis Lieber)在就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职时说道:“一门全面的政治科学课程应当大部分是对文明历史的描述。”^⑤安德鲁·迪狄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是美国历史学会首任会长,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1867年,他就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即建立“政治科学学院”,在他看来,这个学院包含所有的社会和历史科学。秉持相似理念,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于1881年建立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学院;1880年,约翰·W.伯吉斯(John W. Burgess)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在职业化过程中,历史学与政治学携手并进。早期著名的学院派史学家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声称:“我真正想要在这所大学中展现的是历史和政治的实际联合。这种联合是我这个系的主要优势。”^⑥

美国历史学会于1884年成立,而直到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才宣告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研究都没有脱离历史学的影响。在1896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约翰·伯吉斯报告称:“尽管

① 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赵可金:《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美国研究》2010年第1期;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② 杜华:《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焦姣:《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弱国家”神话的解构》,《美国研究》2017年第5期。

③ 参见徐良:《科学化和职业化:美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史林》2015年第5期。

④ Dorothy Ross,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Ran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America”, in George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4.

⑤ 转引自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6页。

⑥ 转引自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105页。

历史中的有些部分不是政治学,同时政治学中的有些元素不是完全的历史,但是,这两个领域如此交叠、渗透在一起,以至于是无法直接被分开的。”^①

政治学家同样承认政治与历史的关联。例如,詹姆斯·布莱斯在1908年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演讲中重申了二者的亲缘关系:“(政治学)是人类活动在历史中的记载……政治学可以被定义为政治历史数据的重新分类,并解释为某些一般原则的结果。它并不比历史更像一门科学,因为它的确定性并不比历史的确定性强。”^②

(二)政治史与政治学在20世纪初的分化

随着职业化的发展,政治学希望从历史的阴影中脱离出来,建立具有自己独立意义的学科范式,而历史学也对政治产生了疑虑。20世纪初,美国的新史学反思过去兰克政治史的写作范式,并逐渐倾向相对主义;而政治学在这一时期越来越科学化,并最终掀起一场以严密和精确著称的“行为主义革命”,双方的分歧日益加大。

兰克的史学模式在19世纪对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美国学界看来,兰克就意味着政治史的模式加上科学的史学方法。^③但是,随着史学发展,年轻一代史学家渴望从兰克模式中脱离出来。20世纪初,鲁滨逊的新史学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毫不客气地将政治史称为琐碎的事实。^④在对兰克政治史模式的反叛中,新史学的后继者们也连带抛弃了客观主义原则。卡尔·贝克尔说:“把历史学看作对曾经存在的现实的一种节略的、不完美的再现……既无损历史学的价值,也无损历史学的尊严。”^⑤他的格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此时流行在史学界的舆论气候,是美国史学转向相对主义的标识性宣言。

在史学从客观主义立场后退的同时,政治学却越来越自信地将自己视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一些学者认为,一组又一组的事实被科学占据之后,剩下的才被称为历史。^⑥美国历史学会不断分离出美国经济学会、政治学会、社会学会,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化,也催促政治学家关心美国的现实政治,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家的指导原则,对总统、国会、市政改革、大众舆论等的政治研究吸引政治学家将目光从历史投向现在。

20世纪30年代后,政治学中掀起了一场行为主义革命。所谓行为主义指的是:“追求研究的严密与系统,并力求通过资料的定量和测量来实现精确性……通过对反复出现的经验性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检验和说明,发现政治行为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⑦

罗伯特·达尔指出,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在推动政治学中行为主义发展中具有突出贡献。^⑧梅里亚姆帮助创建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还培养了大批的弟子,将芝加哥大学建设成当时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的中心:行为主义的另外两个中心: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① John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3, 1897, p. 408.

② James Bryce, “The Rel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to History and to Practic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5, 1908, p. 37.

③ 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⑤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马万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⑥ J. R.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6, pp. 9 - 12.

⑦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⑧ Robert A. 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5, No. 4, 1961, pp. 763 - 772.

的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也都强力推动了行为主义潮流的发展。

政治学追求精确的定量分析,同时发现政治行为中的规律,将自己向科学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历史学则抛弃了政治,甚至走向了相对主义的道路,双方逐渐形成不同的学科特质。但是,政治史和政治学之间的联系,仍然是频繁而紧密的。例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既是一位成果丰富的政治学者,也被认为是一致论史学的重要人物;阿瑟·施莱辛格父子(Arthur Schlesinger and Arthur Schlesinger, Jr.)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与当时的政治学家亦有很多对话。^①

二、美国的新政治史:政治史与政治学的重新汇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史广泛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倡的计量方法和政治理论,甚至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特征的“新政治史”,以此为基础,政治史与政治学重新汇集起来。此时政治史与政治学的合作,源自政治史本身的革新需求,政治史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理论来调整自身,政治学的计量方法和政党政治理论成为新政治史建立的基础。政治史与政治学一起,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界的科学化潮流。

(一)行为主义与美国政治史的计量革命

对传统政治史的不满,是史学家热情投入行为主义的重要原因。传统政治史坚持保守的总统综论式写法,^②在二战后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所谓“内忧”,指的是内部创新冲动衰减,不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外患”是指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对政治史构成巨大压力。^③美国史学界使用数据方法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号召新史学的那一批重要的历史学家——特纳、鲁滨逊和比尔德。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经出现了许多运用数据方法的历史学家,其中对政治史影响较大的是威廉·艾德洛特(William O. Aydelotte)。艾德洛特不断在会议和文章中呼吁并探讨计量研究的可能性。他是首位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历史学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提供了条件,很多历史学家试图将历史学的根基建立得更加科学,他们热情支持技术领域的变革。美国政治史的方法变革离不开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机构积极推动,也得到了各大基金会的广泛支持,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联手改变了美国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面貌。

政治史转向科学化的革命在1957年拉开序幕。这一年,李·本森发表了一篇近八十页的长文,号召使用精确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④同年,理查德·P. 麦考米克(Richard P. McCormick)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在罗格斯大学举办会议,与会人员认为,政治行为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博格称这次会议是新政治史第一次制度性的宣言。^⑤

之后,围绕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会议越来越多。1965年,35位历史学家汇聚安阿伯,在密歇根

① Julian E. Zelizer, *Governing America: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History*, p. 60.

② 传统美国政治史研究,一般集中于总统的政治行为,以总统任期为分界线,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总统综论式写法。

③ 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④ Lee Benson, “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in Mirra Komarovsky, ed., *Common Frontie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ree Press, 1957, pp. 113–183, 418–421.

⑤ Allan G. Bogue, “The Quest for Numeracy: Data and Method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1, No. 1, 1990, p. 95.

大学跨校政治研究共同体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三周的研讨会。从1965年开始,跨校政治研究共同体每年开办暑期研讨班用于定量方法培训。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同样对政治史走向行为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该机构的拉扎斯菲尔德非常注重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其学术观点传导到了政治史领域。他在1944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使用数量方法研究选举,认为选民的社会属性决定其政治行为。^①这样的观点很快被李·本森等一众政治史学家接受。^②

大量研究机构和组织纷纷投入定量研究的浪潮中。普渡大学每年举办经济史工作坊;数学社会科学委员会(Mathematics Social Science Board)组织培训项目、研讨会,资助系列定量研究作品出版。勒华·拉杜里的名言“历史学家未来都将是程序设计员”在当时广为流传。^③同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必须积极接受定量研究的训练,库瑟尔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超过40%的历史学院系提供了计量课程。^④

数据库的建立,为历史学家进行计量研究奠定了基础。政治学家沃尔特·迪恩·伯纳姆在1955年出版了1836—1892年的总统选举数据整理。^⑤20世纪60年代,学界开始广泛的数据库建设,社会科学理事会和跨校政治研究共同体都开始建设政治研究的大型数据库。本森等人也成功地说服美国历史学会在1964年成立了“美国政治史基础数据收集特设委员会”。

在此时的计量风潮中,政治史与政治学相互配合,共同建设学术平台和数据库,形成了松散的、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当博格在1968年首次提出“新政治史”概念时,他将这些新政治史学家又称为行为主义史学家。^⑥行为主义成为总结当时政治史发展的一个标签,这表明了当时政治史与政治学的亲密关系。

(二)行为主义的政党重组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的选举研究

这一时期政治史与政治学的合作,主要表现为政治史广泛吸收政治学的营养。当时的一批政治史家迫切希望建立像政治学一样严谨的历史科学,从而促使政治史向政治学靠拢。在方法上,政治学的行为主义影响着政治史的发展;在理论上,政治学同样哺育了政治史,这种哺育尤其体现在政党政治研究上。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几个重要的行为主义研究中心都非常重视政党政治的研究。芝加哥学派较早地将定量分析方法引入政党政治研究;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凭借对地方选举政治的调查报告,从《人民的选择》开始就影响了一大批研究者。密歇根学派同样对选举政治十分热衷,他们尤其提倡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政党认同”的概念。^⑦

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从政治学中借鉴的最重要概念是“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这一理论最早源于塞缪尔·卢贝尔对1948年美国大选杜鲁门击败杜威的解释。卢贝尔认为,此时美国出

①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4.

② Lee Ben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③ Le Roy Ladurie, *The Territory of Historians*, Harvester Press, 1979, p. 6.

④ J. Morgan Kousse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33 - 473.

⑤ Walter Dean Burnham, *Presidential Ballots, 1836 - 1892*, John Hopkins Press, 1955.

⑥ Allan G. Bogue, "United States: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 No. 1, 1968, p. 6.

⑦ Angus Campbell,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and 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现了从以共和党为主要政党转变为以民主党为主要政党的政治变化。^①但是,卢贝尔并非专业的政治学家,政党重组理论的真正建立一般应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小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关键选举理论》和《持久重组与政党系统》。^②在文章中,基认为关键选举的影响可以持续到接下来的数个选举期,代表着某种政治结构的遽然变化,而选举结果的重要转变也是长期、渐进地累积出来的。在基之后,特别是沃尔特·迪恩·伯纳姆将这一概念广泛应用到政治学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伯纳姆积极投身于数据库建设和政党政治研究,很快影响到身边的政治史学家。

博格在总结20世纪70年代新政治史的发展时提到,政党重组是当时政治史研究中最有统治性的概念。^③政党重组理论既要求用大量的数据材料来检验,同时也是一种长期的政治结构观察,契合了政治史当时的社会科学倾向。在反思传统总统综论式政治史时,政治史也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组织和分期过去的历史。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新政治史将政党重组吸纳过来作为自身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叙事的复兴:政治史和政治学的再次远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政治学和政治史都发生了重要的学术转变,政治学由行为主义过渡到所谓的后行为主义阶段,由注重科学性转向当下的政治问题研究;政治史受到后现代等风潮的影响,随着对计量方法的反思而掀起了叙事的复兴浪潮。学术的转变体现了学者对前一阶段学科发展的反思,随着两个学科的变化,政治史与政治学的合作很快陷入沉寂。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

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从过去的掌控地位上跌落下来,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蓬勃复兴,后行为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学派也相继登上舞台。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更加重视历史,历史只是作为背景和素材被使用。政治学要求关注当下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更加脱离了与历史的联系。

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抛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规范研究,转向更具科学性的实证研究。但是,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的一些政治哲学家对行为主义非常不满,激烈反对新政治科学的价值中立立场。1971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标志着北美政治哲学的复兴。从《正义论》开始,过去长期被压制的经典政治哲学论述又重新回到学界视野。^④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史也开始兴起,特别是英国的剑桥学派取得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并迅速进入美国学界,他们很快影响一批史学家加入对政治思想的讨论。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走向所谓的后行为主义阶段。行为主义学派的领袖大卫·伊斯顿在1969年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演讲中,一开始就这样说道:

① Samuel Lubell,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Greenwood Pub Group, 1952.

② V. O. Key, Jr.,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7, No. 1, 1955, pp. 3-18; "Secular Realignment and the Party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1, No. 2, 1959, pp. 198-210.

③ Allan G. Bogue,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1970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 237.

④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我们当下不断加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压倒。这些危机的严重性被我们痛苦地感受到,并以一种新的冲突形式在我们的学科中显现出来。这个新的和最近的挑战针对的是发展中的行为主义正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

所谓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强烈反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于价值中立的看法,反对强调科学技术而忽视当下的政治。他们主张,重新引入价值和规范研究及关注当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随着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行为主义革命逐渐过渡到后行为主义时期。

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既是对之前过于科学化、标榜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的不满,也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当时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转向,标志着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史也必须重新反思自身。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史从行为主义的浪潮中清醒过来,他们重新发现叙事才是历史学最好的写作形式。

(二)叙事的复兴与政治史社会科学倾向的退潮

历史学科的潮汐变化决定了政治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后,客观性的观念受到质疑,史学内部也逐渐碎片化,朝向社会科学的发展随之中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定量方法的发展,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历史学问题。历史学必须重新评估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回到对人的关注上来。

1973年,两部对历史学影响重大的著作出版,分别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克里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②以之为基础,严格而科学的社会研究,被充满血肉的、以叙事为特征的文化史取代。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开始广泛影响历史学家对自身学科的看法,海登·怀特将历史与某种拟制(fiction)等同起来,从根本上否认了历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化追求。

最具标志性的转折是劳伦·斯通那篇有名的宣言《叙事的复兴》。斯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计量方法的积极拥护者,但在1979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史学家们重新回到叙事上来。^③他的立场转变,很快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新政治史的代表人物李·本森也宣布:自己不假思索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是“错误的转借”。^④有学者将这种从科学立场的退却视为一场悲剧。^⑤一旦历史学不将科学化视为自己的追求和目标,那么,他们当然也无需再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保持联系。

对政治史来说,其学科地位在此时进一步下降。据统计,1975年后,从事政治史的学者占有所有历史学家的份额下降到4%左右的低位。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整体衰微,使政治史的处境雪上加霜。^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史被迫不断自我调整,维系自身与政治学的合作关系变得越发困难。

①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4, 1969, p. 1051.

②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

③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85, 1979, pp. 3 - 24.

④ Lee Benson, "The Mistransfer Fallacy in Explanations of Human Behavior", *Historical Methods*, Vol. 17, No. 3, 1984, pp. 118 - 131.

⑤ J. Morgan Kousser, "Must Historians Regress? An Answer to Lee Benson", *Historical Methods*, Vol. 19, No. 1, 1986, p. 38.

⑥ Robert B. Townse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istory Specialization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December 2015.

政治史与政治学两个学科渐行渐远。此时两个学科的交往往往变成:政治学将历史案例视作研究的素材和数据,历史学则将政治学的理论当作某种简便的分析工具。^①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他们必须依赖大量的历史数据,可为了追求科学性,政治学越来越多地研究细小的、可以被清晰数据回答和定义的政治学问题。复杂且往往范围更大的历史问题,对于政治学家没有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后的理性选择学派,^②总是试图用一些政治学模型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同样偏离了历史。^③而对于政治史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之后,他们就生活在社会史的阴影之下,在80年代后又受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政治史是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对于科学方法的刻意求新,使得这部分政治史学者一直面临指责。定量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很多成绩,但之后,它遭遇了大规模的反对,最终几乎完全取消了政治史向政治学靠拢的科学化倾向。

四、重回“国家”与“历史”:政治史与政治学的重新结合

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在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之后,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得到众多政治学家的青睐。政治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并重新认识“国家”对于政治分析的意义。此时,政治学中出现了找回“国家”和“历史”的口号,推动了政治学向历史的再度靠拢,也使得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崭新面貌。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史复兴成为史学界新的口号,在反思政治史的发展方向时,重新与政治学合作成为学界共识。最近几十年,政治史与政治学彼此从对方身上吸收了营养,促成了本学科的革新发展。

(一)政治学重新找回“国家”和“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要么陷入对政治细节的考察,要么将国家视为某种政治发生的背景,国家在研究中被边缘化。对社会科学家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中颇为盛行,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在考察政治和政府活动时,都采用了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在这种框架下,国家被简单地视为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或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成为一种缺乏自主性的因素,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忽视。”^④

但是,对于国家的长期忽视,必然造成某些政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在学术研究中,尽管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越来越火热,但公众和学生依然对政治保持着一贯的兴趣。在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中,权力被诸多史学家认为是沟通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⑤国家作为最大的权力机构,对权力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呼吁将国家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拉回舞台中央。

对国家作为学术焦点的失落,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在行为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就有

① D. Kavanagh, “Why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Hist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3, 1991, p. 479.

② 理性选择学派主张,行动本质上都是理性的,人们在行动前会考量利害得失做出决定,把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化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在后行为主义阶段,该派理论在政治学领域广泛应用。

③ 参见朱德米:《当代西方政治科学最新进展——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④ 杜华:《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焦姣:《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对“弱国家”神话的解构》,《美国研究》2017年第5期。

⑤ Ann Shola Orloff, “Remaking Power and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6, No. 1, 2012, p. 12.

一批学者以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为名,将目光集中在宏观政治结构上。^①真正开始重新使国家回到学术中心的,是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出现和繁荣。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但在政治研究的行为主义阶段,政治学家普遍将制度作为潜藏在研究背后的给定变量,从而忽视了对制度的关照。随着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制度重新回到学者们的视野。此外,也应注意到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人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考察,促进了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出现。^②

1984年,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批评行为主义对制度的放弃是其重要缺陷,要求重新强调制度分析在政治学中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标志着新制度主义的正式诞生。^③新制度主义出现后,立刻吸引了许多学者转向制度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成为新制度主义旗下的重要分支。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中将制度主义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④彼得斯在《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中尝试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七大类别。^⑤他们承认历史制度主义在新制度主义中具有重要地位。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学者开始以历史和制度为内容进行政治学研究。1978年,彼得·卡赞斯坦在《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中论及历史制度主义的某些观念;^⑥1979年,西达·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首次涉及“国家中心”这一概念。^⑦1985年,斯考切波的想法进一步转化为“找回国家”的学术口号,在政治学中掀起了国家研究的热潮。^⑧1992年出版的《结构化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⑨回顾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研究的范例,之后“历史制度主义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政治科学界频繁使用的词汇”。^⑩斯考切波后来的文章进一步澄清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和问题,提出了这一研究取向的学术纲领。^⑪

国家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问题,以历史制度主义为依托,许多学者围绕国家构建进行学术研究。以斯蒂芬·斯科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提出“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一套理论,重视美国政府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1986年,《美国政治发展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① Samuel P. Hays,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③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4, pp. 734-749.

④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1996, pp. 936-957.

⑤ 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Wellington Horse, 1999.

⑥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⑦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⑧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⑨ Sven Steinmo, Kathleen An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⑩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第8页。

⑪ 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Vol. 3, No. 1, 2002, pp. 1-32.

Political Development) 杂志创办,进一步将美国政治发展研究推向高潮。美国政治发展研究为美国政治史的书写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使许多史学家注意到政府及其管理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

伴随政治学中回到“国家”的趋向,重新与“历史”结合成为政治学的广泛共识。二战后,历史社会学即主张将社会研究与历史结合起来,查尔斯·蒂利就与当时运用计量方法的政治史家们过从甚密。后来的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斯考切波等人同样没有放弃历史。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者转向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从而使这种历史转向更多地扩展开来。^①

(二) 政治史重新转向政治学

在经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洗礼后,政治史成功改造了自身,此时的政治史已与过去截然不同。同时,美国历史学作为整体逐步走出后现代和文化史的影响,政治史开始思考在文化史之后、在后现代之后自身的革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史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重新引入政治学成为许多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推动了政治史在诸多前沿领域的发展。

1. 政策史

政策史是政治史与政治学新的结合部,也是近些年史学界发展较快的领域之一。1989年《政策史杂志》(*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创办,推动了这一方向的快速发展。政策史多与其他学术领域相结合,如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等,往往考察社会、政治各要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政策史又与制度史相联系,关心政策在机构中的实际执行以及政策本身的不断变化。政策史需要不断应用政治学的理论,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考察,成为当下充满希望的跨学科研究方向。^②

2. 保守主义研究

近些年美国政治极化严重,政治右转倾向明显,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美国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研究在政治史和政治学中都产生了大量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史的范围。1994年,亚伦·布林克列还在提醒同行未给予保守主义应有的关注,而今天保守主义研究已蔚为大观。^③

3. 社会运动研究

社会运动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治史的交叉领域,环境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领域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近些年,还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等,这些是政治史和政治学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社会运动如何影响政治与政策,是现在政治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也要求两个学科进行优势结合。^④

4. 行政机构和专家团体研究

这一内容部分地从属于“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同时也往往与政策制定结合起来。例如,在考察环境时,不应只考虑环境问题本身,亦要注意专家和环境管理机构。专家本身作为科学的代表并非

① 参考西达·斯考切波主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董国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理查德·拉赫曼:《历史社会学概论》,赵莉妍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② Robert Kelley, “The Idea of Policy Hist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0, No. 1, 1988, pp. 35–39; Julian E. Zelizer, “Clio’s Lost Tribe: Public Policy History Since 1978”,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 12, No. 3, 2000, pp. 369–394.

③ 参见 Alan Brinkley,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9, No. 2, 1994, pp. 409–429。《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杂志》在2003年、《美国历史评论》在2011年都举办了有关保守主义研究的圆桌论坛。

④ Lawrence S. Wittner,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Bomb: Resisting the Bomb—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54–197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eg Martin, *Understanding Social Movements*, Routledge, 2015.

是中立的,而环境管理机构的行为也影响着环境政策的实施。^①

5. 资本主义史与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W. 福格尔(Robert W. Fogel)等人开创的新经济史与政治史一起成为促使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化的重要推手。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经济史研究同样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了。但是,在最近二十多年,以“新资本主义史”为名重新考察历史中的物质因素,成为历史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以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也为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交叉领域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是历史学家最关心的话题。^②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甚至奴隶制与种族的作用,是新资本主义史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经济学及历史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相互合作成为令人期许的学术现象。^③

6. 法律史、劳工史、种族政治、性别政治等相关研究

实际上,宪法史、劳工史、性别史、种族史是美国历史学家长期耕耘的领域,而政治学对这些领域同样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完全可以期望双方相遇而引发学术增长。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如法律发展如何重塑社会和政治关系、经济的变化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种族关系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女性如何参与公共政治等,这些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④

余 论

政治学为政治史提供了重新把握过去长时段政治变化的方式。通过与政治学建立紧密的联系,历史学家可以不断更新自己对过去政治的认识,政治学提供的各种理论模型,可以帮助政治史建立新的历史叙事。同时,历史也为政治学提供了充分的研究材料及必不可少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历史学尤其是政治史补充了政治学以数据分析为主的定量实证研究,增进了政治学对研究对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尤其是在长时段的政治分析和比较分析中,历史学的方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两个学科的分合过程使我们意识到,学科之间的互鉴合作,可以推动学科的革新发展。

阶段性的合作与疏离,形成了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的分合变化。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学科自我革新的需要。正是出于对过往政治史写作方式的不满,美国的政治史才会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也在对计量的反思中于20世纪80年代重回“叙事”。美国的政治学同样如此,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其出发点皆在于对过往政治学研究的反思。后来的新制度主义要求找回“国家”和“历史”,其主旨仍是要革新政治学的思考模式。两个学科还受到学术风气变化的影响,在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较强的时期,美国的政治史立刻就从社会科学化的道路退缩回去。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想退潮,新一轮的学科合作正在出现。小威廉·休厄尔认为,随

① Aya H. Kimura and Abby Kinchy, *Science by the People: Participation,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于留振:《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③ Jeffrey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7; Sven Beckert, *The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Alfred A. Knopf, 2014.

④ Robert C. Lieberman, *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gnieszka Graff and Elzbieta Korolczuk, *Anti-Gender Politics in the Populist Moment*, Routledge, 2021.

着跨学科研究大行其道,也许正是“回归学科分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预兆”。^①

二战后,美国政治史长期处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遮蔽之下,近些年仍不时引起史学家们的担忧。但是,政治史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学术活力,反而通过与社会史、文化史的沟通,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广泛联络,极大扩充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当前政治史的发展面临着双重张力:一方面,政治史作为最传统的史学领域,面对文化史、性别史、环境史等新兴领域,难免相形见绌;但政治史同样在发展中更新了自身,政治文化、性别政治、环境政治等都成为政治史的子领域;另一方面,政治史既受到叙事复兴和文化转向的影响,又有与社会科学相合作的趋向,如何保持叙事与科学的平衡也是历史学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将性别、文化、记忆、情感等内容加入政治史的视野,如何借鉴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当下政治史发展的重要挑战。

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政治史与政治学之间必须要紧密联合,最近几年“历史政治学”成为国内广泛流行的政治学概念,许多政治学家注意到西方政治学转向历史的现象,呼吁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必须将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历史与政治本身就密不可分,认识历史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而理解政治则需要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②他们认为,“历史政治学”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复杂性。^③从政治学的角度如此,从历史学的角度亦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④历史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中去,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作者胡宇哲,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讲师;邮编:300387)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崔瑾)

① 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赵吉、徐勇、杨阳等:《回归还是创新:历史政治学的共识与反思》,《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③ 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郭台辉:《西方政治学转向历史的三个层次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0期;等等。

④ 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organizing facts. In the last decade, scholars such as Jouni-Matti Kuukkanen and Paul A. Roth have challenged this long-standing view of historiography that has dominated Western theories of history.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y argue that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seen as an argumentative act between historians and others, aiming at justifying claim(s)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the past. By grounding historiography with non-representationalist views, their theories of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re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objectively judge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but also fit neatly with historians' actual practice. However, non-representationalism fails to conform to historians' self-perception of their work, which might result in historians' rejection, even potentially undermining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us, scholars should treat non-representationalism with careful analysis.

The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Ma Kefeng and Wang Zic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estern-originated “civilization” narrative and the “evolution” thought had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istory textbooks us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lso profoundly transformed by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s a historiographic genre. The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promoted both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justified the colonial aggression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These contradictions were also reflected in history textbooks. On the one hand, these textbooks were infiltrated by concepts such as “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 and “struggle for survival”, which implicitly endorsed Wester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imp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driven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pursui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civilizational self-awareness, these textbooks not only limited the scope of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but also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vision for a world with “multiple civilization”.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a civilization narr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gan to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 textbooks in China.

“A Reversal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n Yin and Zhou Dynasties”: Fu Sinian’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 Liu Chunqiang

Fu Sinian was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bearer and helmsman” of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School. He was not only the decision-maker of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Yin Ruins in Anyang in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ut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hang dynasty. Fu Sinian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with a scientific spirit, whose research approach transitioned from literary history to historiography and the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of the Shang dynasty developed as the focus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rming a distinctive academic style. Fu Sinian's study of the Shang dynasty reflects his cultural concerns, turn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issues into practice.

Shared Root but Divided Paths: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Hu Yuzhe

The kinship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s been deeply imprinted on the two disciplin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in early years had always centered on political research, and historians collaborated with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study historical politics. However, as both disciplines became mor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ized,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radually separated. The resumption of their cooper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 both discipline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he 1970s and 1980s, with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history and the internal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o trivial political segments and a move towards post-behaviorism.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once again diverged. Despite all the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history has extensively borrowed concepts and methods from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science has also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of borrowing insights from history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is led to both disciplines' renewed attempts at collaborati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olitical science started to explore new fields such a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research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iming at reclaim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policy history also extensively draws on political sci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is cruc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s a whole. By trac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 can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ng China-related Knowledge at the Royal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1660 – 1820) // Zhuang X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and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s, it is significant to re-examine how glob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come intertwined. By analyzing specific cases and methods of the Royal Society's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of China-related knowledge from 1660 to 1820,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By doing so, we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ociety acquired China-related knowledge. The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system, the Jesuit information network, logistics mechan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personnel have jointly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pathways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The history of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also contains valuable experience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 Xu Xiangyun

For a long time, the American academia has avoided discussing the existence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t until in the 1960s did this lack of attention start to change. Driven by social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currents, American scholars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erial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result,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delve into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 expansion and overseas activities,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like diplomatic activitie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personnel flows, domestic policies, social currents and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enhanced its critical nature, and facilitat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offering a valuable historical approach that warrants further research.

Value Critiqu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Hans-Ulrich Wehler's Social History // Wei Peiyun

Hans-Ulrich Wehl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ans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In the analysis of Otto von Bismarck and German imperialism, Wehler demonstrated the basic path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German historiography of interpreting Bismarck and the Second Empire through the lenses of national rationality, idealism, and historicism.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diplomatic first", he employed a new approach of "domestic first", which is more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ditions, treating them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Bismarck's policies and his imperialist idea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Reich, Wehler employed the long-term origin theory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showing strong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which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Wehler's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rman critical reflection on Nazism after World War II.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values and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w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ehler has left a rich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rough his academic thoughts, public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ttitude.